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赵伟

第四卷·报告文学①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赵伟

第四卷·报告文学①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1—1945 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第四卷, 报告文学 / 张中良主编; 赵伟分册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86-0171-9

I. ① 1… II. ①张… ②赵…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IV. ①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7658 号

1931—1945 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第四卷·报告文学

1931—1945 NIAN DONGBEI KANGRI WENXUE DAXI DI-SI JUAN • BAOGAO WENXUE

赵 伟 主编

责任编辑	杨琳琳 刘 双 张微微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03
字 数	1156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171-9
定 价	308.00 元 (全 3 册)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说明

20 世纪的中国抗日战争,最早在东北打响,最后在东北胜利结束,东北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容忽略的独特地位。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映射出东北抗日的悲壮历史,无论是抗战文学史,还是整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东北抗日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为了纪念以鲜血与生命书写抗日文学的英烈先贤,为了牢记血火交迸的历史、走向和平发展的未来,我们编辑出版了《1931—1945 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这套丛书以体裁分编,以新文学为主,兼收旧体诗词与文言作品。作品浩如烟海,篇幅所限只能收入代表性较强的作品,其余以存目方式呈现。

丛书所收作品的作者多出生于东北,或虽非东北籍,但在东北生活、学习、工作过,这些作者表现关内抗战的作品也适量收入;关内作者表现东北抗日的作品也在选编范畴之内,以此说明东北是中国之东北,呈现举国上下对东北命运的热切关注。在当时复杂敏感的政治环境下,迫于压力,一些作品中的个别表述未必符合当今的导向,但其抗日的主题思想是积极进步的,因此本丛书也予以收录。此外,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个别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等其他的时期政治思想出现摇摆,甚至错误。鉴于此,本丛书只选取其有关抗战的政治取向积极的作品,对于其他时期该作家的不当言论,本丛书不予认同。

作品编排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作品绝大部分写于 1931 年九一

八事变爆发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个别作品的完成时间略有延伸。大部分作品结尾标注了写作时间,有一部分写作时间不详者标注了报刊初次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间。

这套丛书有幸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与专家学者的支持,章海宁先生参与前期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由衷感谢!

丛书编辑过程中参照了此前出版的多种文集,感激自在不言之中!有些则从原刊辑录,首次收入文集。除对明显的误植予以订正之外,一般保留原本面貌。

《1931—1945 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编委会

2016 年 10 月 20 日

总 序

张中良

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与历史叙述中,抗日文学所占的比重同抗战历史与抗日文学的体量及建树相比明显不足,其中关于东北抗日文学的叙述更见薄弱,通常是卢沟桥事变之前追溯东北作家群的抗日题材创作,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东北作家投身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热潮之中,便很难再见到东北抗日文学的独特身影,东北抗日文学被等同于1937年前后的东北作家群创作。这种历史叙述缩短了东北抗日文学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历史跨度,简化了其创作主体的复杂构成,遮蔽了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审美建树,低估了东北抗日文学的历史贡献,着实令人遗憾。究其原因,十分复杂,有根深蒂固的中原心态对边地文化的轻视,也有历史学界对东北抗日在抗战史上地位的忽略,还有文学史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主潮的认定对民族话语的挤压,等等。如今,中国抗战史发端于1931年渐成共识,20世纪30年代民族话语的重要性也愈益得到文学史界的体认,东北抗日文学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了相当的积累,这套《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就是集中的展示。这些都为东北抗日文学价值的重新认识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

一、东北抗日文学的历史背景

现代文学史界对东北抗日文学的关注不够,同对东北抗日认识的模糊有关。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这种看法已经成为历史常识。甚至由此引申出极端的表述,说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噬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有四篇涉及这一事变的杂文影响甚大。第一篇是1931年10月23日发表于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在抨击“民族主义文学”时,说“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①。第二篇是写于同年10月29日、12月11日在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的《沉滓的泛起》,开篇说:“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②其实,要吞并不等于已经“吞了”,在1931年10月底之前,虽然日军已经占领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地,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辽宁省锦州等仍在中国军队掌控之中,“吞了东三省”尚未全部变成现实。第三篇是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二期所刊《“友邦惊诧”论》,说:“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后文还有一次说道“日本帝国主义的兵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队强占了辽吉”。^① 文中两次说是“辽吉”，一定是意识到此前的“吞了东三省”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但后文中又说：“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②第四篇是1934年11月21日为英文刊物《现代中国》而完成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③这里姑且不论鲁迅的观点及感情态度，仅就事实的陈述而言显然有悖于史实。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词汇用法可能与今天不甚一致，鲁迅又是在写杂文而非严格的历史叙述，杂文可以运用夸张、假设等修辞手法，可以穿越古今、预见未来，1932年2月5日哈尔滨失守，3月1日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出笼，“吞了东三省”的确变成现实。东三省终于被吞的事实，被后人当作鲁迅上述四篇杂文的根据，在教师讲解与学者征引鲁迅杂文话语时，往往强调的是吞并的结果，而忽略了其过程。这样容易使人误以为日军未遇抵抗、长驱直入，1931年9月就占据了东三省。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觉得，既然没有抗日，何来抗日文学？

但是，问题在于：上峰下令不抵抗（无论是蒋介石着眼于“安内”，且寄希望于“国联”遏制日本，还是张学良误判形势，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③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低估了日本吞噬东北的野心,也无论是原则上的指示,还是具体的命令^①),并非意味着下级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军队主体不抵抗,并非等于所有的军队都不抵抗;况且,除了军队之外,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突起之际,军队并非全如被动挨宰的羔羊,沈阳、长春等地守军即有应激性的抵抗。驻守沈阳北大营的第七旅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与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的率领下,与日军激战数小时,突围出北大营。其中,六二〇团毙伤日军40余名。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武装抵抗日军,我方一位连长阵亡。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进攻。因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命令“如有日军进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让,听候交涉解决”,二道沟中东路护路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二营当日军进营时未加抵抗,日军强令缴械投降,营长傅冠军坚决不从,被日军突然开枪击成重伤,旋即殉国。二营官兵奋起抵抗,因子弹库被日军机枪封锁,有枪无弹,拼死突围,伤亡百余人。^②南岭驻军炮团与步兵团勇敢迎战,且战且退,伤亡400余人。入夜,长春始告陷落。至少毙伤敌军145人,其中击毙66人。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稍后,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参谋长荣臻先后赴锦州办公。锦州附近,我军集结四个旅以上建制的部队。

①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打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86页。

② 参见王晓辉:《中国革命战争纪实·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7页。

10月,消灭两股日军收买的汉奸土匪武装。11月27日,我装甲车部队在北宁线与日军激战。12月22日,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三旅,步兵第二十旅、第十二旅,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公安骑兵部队等,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顽强抵抗日军进攻。12月25日,改组后的南京政府给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下达“积极抵抗”的电令,翌日,张学良向荣臻参谋长下达实施抵抗的电令,但是,在日军增加兵力、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大攻势面前,东北军一线部队伤亡严重,护路队中山号铁甲车被击坏,张学良一再向南京政府苦苦求援,只得到“迅速办理”的一纸空文,未见一弹一钱的实际援助。为保存实力,东北军没有做出拼尽血本的激烈抵抗而无奈撤守,1932年1月3日,连接关内外的锁钥之地锦州失陷。

1931年10月11日,张学良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军事总指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931年10月中旬,黑龙江省守军击退日军飞机与铁甲车助阵的伪军攻势。11月4日起,马、谢指挥所部(四个旅两个团以上的兵力)在嫩江江桥防线抗击日军,史称“江桥抗战”,11月4日一天就致敌遗尸400具以上。但黑龙江守军孤军作战,武器落后,因损失惨重而于11月19日撤出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苦战半月的江桥抗战致日军死伤千余人,创造了以步枪击落一架敌机的奇迹,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击落日本军机之先河。9月至12月间,富拉尔基一带和腰库勒、朱家坎一带,东北军也与日军发生激战。

吉林驻军虽有部分受熙洽裹挟而附逆,但也有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等部忠贞爱国,勇敢抗命。1931年10月8日,日本测量人员擅自闯入第二十六混成旅六六六团第三营驻地瓮声砬子,强行勘测,被守军击毙数人。11月23日,营长王德林率部反正。由于东三省特区哈尔滨的特殊地位,日军先令伪军于1932年1月27日发起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的进攻,被东北军李杜的第二十四旅、丁超的第二十八旅、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与义勇军击退,继而日军赤膊上阵,东北军第二十二旅在双城车站设伏,痛击乘列车到此集结的日军第三旅团先头部队,重火力加之以刺刀肉搏,致日军死伤惨重。参加哈尔滨保卫战的除了义勇军与上述部队之外,还有宋文俊的第二十六旅、马占山的苑崇谷旅等。连日血战,但终因轻武器难敌飞机、坦克、重炮等重武器,哈尔滨于1932年2月5日沦陷。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2年2月5日,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陆续沦陷。此后,曾诈降而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的马占山率部反正,苦战抗日,1932年12月上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辗转回国后,请缨无路,直到卢沟桥事变后,任职东北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率部在绥远一带抗日。冯占海所率抗日救国军于1932年底转至热河开鲁地区,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改编为陆军第六十三军,1933年投入热河抗战与长城抗战。

东北原野广袤,山深林密,古时原住民多以狩猎或游牧为生,历代移民中,有战争中的流动人口,也有流放者、逃亡者,更多的是19世纪初以来大批涌入的逃荒者、探险者。独特的地理环境、源远流

长的人文历史、复杂多元的人口构成,养成了东北人粗犷雄强的性格。近代以来,俄罗斯、日本对东北的渗透与侵夺,激发起东北人民的爱国心。1931年6月,兴安屯垦区公署军需处处长兼第三团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震太郎等4个日本间谍,即已表现出东北军人的爱国精神与处事风格。九一八事变爆发,上峰下令不许抵抗,东北军大批撤出时,部分官兵、警员抗命不撤,奋起抵抗。民间武装力量,如地方民团、地主护院、山中绿林,不忍听任国土沦陷,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工农商学各界人士也揭竿而起,风起云涌。非官方抗日武装力量,名目繁多,在前面冠有中国或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地区名,后面加上国民救国军、血盟救国军、民众自卫军、民众自卫义勇军、抗日同盟军、抗日联合军、青年铁血军、反日游击队、反日义勇军、救国义勇军等,但名气最大者为其总称“抗日义勇军”^①。

近代以来中国官方文献正式使用“义勇军”一词者,大概是张学良于1929年10月4日颁布的《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其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本条例得适用之。”“凡属个人者,定名为国军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这一条例是在中东路事件中苏武装冲突正在进行时出台的,张学良显然是想借助民间力量保家卫国。张学良的好友、曾任东北军空军少将司令的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即率领冯庸大学拒俄义

^① 1932年11月,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上海的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合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一种说法认为朱庆澜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前黄显声即为事实上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

勇军北上抗俄,但由于苏联强大的军事优势,中东路事件于12月下旬以中方失利而告终,国民义勇军事实上并未形成张学良所期待的局面。倒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义勇军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抗日义勇军在辽西地区兴起最早。九一八之前,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经请示张学良同意,曾把大量军队更换下来的旧武器发放到各区县公安系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显声与督察长熊飞在率领公安警察部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组织民团、警察队,收编绿林,吸纳各界人士,统一改编的义勇军分22路,达6万余人。辽南有张海天(义匪“老北风”)、项青山、吴三胜、王全一、林子生、李纯华、李烈生(李兆麟)、苏景阳等部;辽东南三角地带有邓铁梅、苗可秀等部;辽东有唐聚五、王育文、张宗周等部;辽北有高文斌领导的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贾秉彝、刘翔阁的第十五路义勇军,于德霖的第九路义勇军,赵殿良的第二十一路义勇军,张士林的第十四路义勇军等。吉林有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的吉林自卫军。黑龙江省有马占山的抗日救国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部。张学良通过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对义勇军给予干部、财务、物质与军械弹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也积极发布指示并派员参与,加强对义勇军的援助与领导。^① 名目繁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兵力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亦有40余万、50余万二说),活动范围达90余县,占东北三分之二的地区,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据《满铁档案》记载,1931年11月至1933年8月,日本关东军及朝鲜军在东北被击

^① 参见赵冬晖、孙玉玲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毙者 1896 人,其中有第八师团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等高级官佐,被击伤者 4577 人,总计死伤 6473 人,占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总数的三十五分之一。^①但由于自身成分复杂^②,协调不易,南京政府态度暧昧,东北军大部撤出,日本调集大批兵力实施严酷“讨伐”,义勇军牺牲惨烈,损失惨重^③,1933 年初起,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抗日高潮渐次落潮,余部或转进热河等地,或在东北坚持独立作战,或融入后来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之时,举国称颂,世界瞩目,其爱国情怀和用鲜血与生命赢得的战绩表现出东北军民不屈的骨气,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因而永恒地铸进了抗战史册。正是义勇军冲锋陷阵的抗日烽火,为《义勇军进行曲》所代表的抗日文学最初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中央迅疾做出反应,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谴责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号召民众武装起来以回击侵略者。中共派出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魏拯民、李

① 参见赵冬晖、孙玉玲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9—271 页。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 141—142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修订版)记载:“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 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 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 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 5%。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 50 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

③ 王承礼主编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 页)说:“40 余万人的抗日队伍,在战斗中牺牲的有 15 万多,负伤的有 8 万多,溃散的有 7 万多,退入苏联境内的有 3 万多,撤至热河的有 3 万多。”

1931—1945年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兆麟、周保中等共产党人赴东北（或在东北就地）组织并领导人民在极为困难的境遇中武装抗日。就在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刚刚登场的1932年4月12日22时许，一列运载日军第二师团官兵与大量物资的军列通过哈尔滨郊区成高子站所属丁家桥涵洞上方时脱轨颠覆，从六米高的路基上翻坠下来，引起爆炸，浅妻大尉等54个官兵当场丧命，轻重伤93人。^①成功实施此次重创日军行动的，是黄埔出身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学生范廷桂。不久，范廷桂在日伪大搜捕中被捕，英勇就义。赵尚志则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2月12日壮烈牺牲。

在原东北军政系统留下的人员与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由高涨到遭受重大挫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渐发展、扩大，由最初的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等，发展到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二路军，下辖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第三路军，下辖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第十一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损失惨重的东北抗联主力退入苏联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军

^① 参见萨苏：《红色的第一滴血——赵尚志颠覆日军“凯旋列车”始末》，《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下），西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95页。

后勤序列中称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进行休整训练,其间亦曾派人回国执行作战与侦查任务。在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月,此前几年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军全面进攻之前对辽吉黑三省 57 个战略要地发动空降作战,进行侦查,建立桥头堡与电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仍有部分抗联部队坚守在白山黑水之间,最后迎来了东北的光复。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带人接应出山。^① 抗日联军中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汪雅臣、魏拯民、王德泰、李延平等辉耀史册的英烈与八女投江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剧。

东北抗日武装在逆境中顽强战斗,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东北军民歼灭日军 17 万人,最后拖住日军 70 余万人,有力地支援了关内抗战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一血红雪白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悲怆而雄壮的东北抗日文学。

二、东北抗日文学的创作主体

过去,人们谈及东北抗日文学,往往仅仅归之于东北作家群。其实,东北是中国的东北,黑土地的命运关乎整个神州的命运,东

^① 第十军一部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的事迹,参见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上),西苑出版社 2013 年版,《写给不做亡国奴的人们(代序)》,第 9 页。

北人的血脉连着关里人乃至全球华人的血脉，生死场上的惨叫、旷野上的呼喊，无不触动着中国文学的敏感神经。

较早以文学形式表现九一八事变给国人带来的震惊、愤慨与抗战呐喊者并非新文学作家，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他们将复杂的体验与迫切的希望寄托于文体传统源远流长的旧体诗词。譬如上海东南医院医学教授姚伯麟《辽警有感》对当局“只依赖国联，劝国人镇静”的政策提出质疑：“独使万民持镇静，诸君何以退夷兵？”教师李贯慈《哭辽东》吟道：“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同为教师的希鲁在《日本入寇东三省感赋》中写道：“尝胆惟期歼丑虏，枕戈莫怕抗强权。同胞今日应同起，仔细艰难任仔肩！”王一甲《日占东省有感》呼吁：“同胞奋起共杀贼，定国磐安在此刻……君不闻，男儿职志守河山，血染征衣亦快哉！”东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苗可秀等组织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征写军歌，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刘永济作《满江红·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军歌》，以“交趾铜标勋迹壮，燕然勒石威名烈”的传统，期许年轻的学子“把乾坤、大事共担承”。^①马占山率部江桥抗战，赢得国人的钦敬。旧体诗词中涌现出房仙洲《咏马占山》、石颜也《黑马歌》、钱小山《马将军歌》等一批作品，称颂马占山。汪洽笙《感时事》赞颂道：“掀天一役嫩江桥，闻道屯军耐苦鏖。炮弹已轰孤愤抵，剑锋乍试虏魂消。”星槎《慰马占山将军》其二吟道：“外侮凭陵万弩来，三军屏息亦堪哀。江桥一将心犹赤，敌阵千人骨已灰。众志成城民族铎，中流砥柱栋梁材。南中久洒新亭泪，今日欢

^① 陈汉平编注：《抗战诗史》，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